



**PUBLIC INPUT
CLERC CENTER**

2018年公众意见调查结果：对耳聋或听力障碍儿童发展的理解缺失是一大障碍

作者：Amber Marchut 博士，Amy Lambert 硕士

鼓励读者复制并传播本文！

个人与机构在符合以下条件的情况下，可自由复制和传播本文：1) 传本文需完整传播，包括封面和版权页；2) 如仅传播节选内容，须在首页或网页首页清楚标明下列版权信息，并在每页页眉或页脚注明作者及标题；3) 所收取的任何费用仅限于补偿复制成本；4) 需将您打算传播本文的意向及预计接收人数通知克莱克中心。

克莱克中心使命声明

克莱克中心是一家由联邦资助的全国性聋人教育中心，其使命是确保全国范围内多元化的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从出生至 21 岁）能够接受教育、获得赋权，并具备最大化其潜能所需的语言能力，从而成为社会中有生产力和有贡献的成员。这一使命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及早获取与习得语言、卓越的教学、家庭参与、研究、识别与落实最佳实践，以及全国各地学校与项目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

版权所有 © 2025 洛朗·克莱克全国聋人教育中心

加劳德大学，华盛顿特区

保留所有权利。

ISBN: 0-88095-298-9

如有疑问或反馈，请联系：

洛朗·克莱克全国聋人教育中心

收件人：监测、评估与研究部

800 Florida Avenue, NE

MSSD, 210 室

华盛顿特区，邮编 20002-3695

电子邮箱：clerc.input@gallaudet.edu

网站：<https://clerccenter.gallaudet.edu>

本出版物中报告的活动由联邦资金支持。发布这些活动内容并不表示美国教育部对其中的发现、结论或建议的认可或接受。

加劳德大学在其项目、设施和就业中，提供平等的访问机会和待遇，不因种族、肤色、性别、怀孕、分娩、哺乳及相关医疗状况、宗教、国籍、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或性别表达、年龄、残疾、退伍军人身份或任何联邦法律、《哥伦比亚特区人权法》或其他适用法律保护的类别而受到歧视。

致谢

本项工作是团队合作的成果，没有参与者的支持，工作不会如此有说服力。LaWanda Jackson 在数据支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注释

本档中的信息应按以下格式引用：

Marchut, A., & Lambert, A. (2025). *Public input 2018 survey findings: Lack of understanding as a barrier to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potential*. Washington, DC: Laurent Clerc National Deaf Education Center, Gallaudet University.



概述

“缺乏理解”模型是基于受访者对“缺乏理解”这一障碍的反馈所作出的诠释。“缺乏理解”是由美国盖洛德大学洛朗·克莱克全国聋人教育中心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发布的全国公众意见调查中确定的 14 项障碍之一。受访者包括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家长、照护者，以及与这些儿童和家庭合作的专业人士。该调查邀请受访者就阻碍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在学业、语言以及社会情感方面充分发挥潜力的障碍发表评论。“缺乏理解”是其中一项受关注的障碍。受访者指出，对于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需求，社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理解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影响他们的整体发展以及实现最大潜能的能力。

这一切始于社会认知，即社会大众对耳聋和听力障碍群体的整体认知与看法，而这种认知会影响以下七个方面：

1. 法律与政策
2. 早期听力检测与干预（EHDI）
3. 语言与交流
4. 听力辅助技术（HAT）
5. 家庭参与
6. 学校教育
7. 合作

社会认知由不同个人和群体的观点、经历与知识构成，这些因素会影响立法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式。立法和政策的要求决定了 EHDI 系统（早期听力检测与干预）的协调与落实方式、HAT（听力辅助技术）的重视与提供程度，以及满足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语言与沟通需求的方式。这些要求会影响家庭与教育专业人员在语言、沟通以及 HAT 方面的资源分配与信息共享。反过来，家庭与教育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这会形塑他们对于如何支持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以及如何开展合作的看法。由此产生的知识需求包括培训、教育、更有效的资源分配以及信息共享，这些最终都会影响耳

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发展，以及他们实现最大潜能的能力。上述各类因素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背景的家庭，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上服务不足群体”（TUGs）的家庭。“缺乏理解”模型展示了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以下将进一步详细说明这种关系。接下来会先分别介绍每个类别，然后再解释它们之间的重叠部分（图中以斜线标注）及相互关系。

社会认知

在模型的最上方，统领并影响所有其他类别的，是社会对“成为聋人或听力障碍者”的整体认知。对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既作为个体，也作为群体成员——缺乏理解的根源在于社会，这个社会包括家庭、与聋人及听力障碍儿童及其家庭合作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如立法者）、决策者、潜在雇主与工作环境、所在社区以及普通公众。受访者指出，耳聋和听力障碍属于“低发生率”现象，这使得社会对这一群体的了解和经验相对有限。这种局限往往伴随着对耳聋和听力障碍者的负面偏见，凸显了增加资源、开展培训以及促进协作以改善社会认知的必要性。更深入的理解不仅能带来更有效的支持，也能增强满足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需求的意愿，从而帮助他们顺利达成各类发展里程碑。

以下是与“社会认知”相关的部分受访者回应示例：

“……总体来说，社会普遍缺乏对聋人/听力障碍者（D/HH）需求的理解。当家长缺乏这种理解时，他们就无法为孩子的需求进行恰当的争取……”

“听人仍然把聋人当作稀奇的存在。由于这种缺乏理解，如果孩子的父母不是聋人，就不会有任何期望，家庭参与和支持几乎没有。孩子因此在生命早期失去了任何有意义的沟通机会……”

“…缺乏理解——我觉得我们仍需要向公众普及有关聋人教育的知识，以及它与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重大差异。只要持续对公众进行教育，我相信他们的观点与关注会有所改变和改善……”

“我们[听人]对耳聋和听力障碍者的期望太低了。大多数人几乎没有接触过这类人（除了年长的亲属）……”

“听人的世界不了解听力损失。他们无法想象听力障碍对 DHH 群体在日常、每小时的影响。因此，他们不知道问题有多紧迫，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缺乏足够且恰当的资源，加上多年来的误解与错误引导，给所有相关人员制造了许多障碍……”（家长）

“我认为大家普遍认为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表现不如他人，但如果能进行早期筛查并配备合适的技术（如 CART），这些学生完全可以与听力正常的学生一样取得好成绩。”

“听力损失是一种非常低发生率的残障，因此人们对它缺乏理解……”

“很多听人完全不了解聋人的意义、ASL（美国手语）的意义及其文化！聋人的语言是 ASL，这意味着他们在与听人交流时可能会遇到障碍……许多工作岗位几乎不雇用聋人，或不让他们加入/获得工作，因为聋被视为一种残障。他们需要明白，聋人不是残疾人，他们只是听不到、说不了而已！我们都是人类。这是他们首先必须努力改进的地方！！”

法律与政策

对有效立法和政策缺乏理解（这是“缺乏理解”模型中的下一个类别）会对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及其受教育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学校安置及提供便利条件方面带来问题。相关立法包括《残疾人教育法案》（IDEA）以及《个别化教育计划》（IEP）等。本部分重点关注正式颁布的立法与政策，以及审查这些立法与政策以更好地惠及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他们的家庭以及与他们合作的专业人士的必要性。

受访者提到，需要解决这种理解不足的问题，并建议决策者与聋人及听力障碍人士有更多互动，尤其是让聋人及听力障碍人士在部分决策过程中担任主导角色。调查中的引言在不同部分频繁提及立法与政策，反映出这些法律与政策在制定和实施时，缺乏对如何最佳支持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及其家庭的深入理解。因此，有必要制定更完善的立法与政策来支持这些家庭和儿童。由于这一不足，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他们的家庭以及与他们合作的专业人士在帮助学生充分发挥潜能的过程中面临更多挑战。立法与政策的普遍存在也表明，该类别对后续六个类别具有整体性影响。

以下是与“立法与政策”相关的部分受访者示例：

“……该州]需要允许聋人专业人员/实习生在大楼内进行互动，这样立法者才能更好地理解聋人的多样性（例如听力损失程度、听力障碍类型、沟通方式等）……”

“……首先，国家和州的政策与立法决定了资金分配，并制定了可能对聋人/听力障碍群体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法律。在这一领域缺乏理解，使我们的学生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给予聋人/听力障碍学生他们所需要的支持；他们得到的只是最低限度，有时甚至是极其有限的支持。由于立法者和教育部缺乏相关知识，他们的需求得不到重视……”

“……政府需要理解聋人/听力障碍学生的需求，并为学校提供更多资金，以便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等……”

“……然而，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政策与立法。当聋被视为一种需要‘修复’的医学问题时，人们很少真正接纳或欣赏聋与语言，所制定的法律往往更多是在阻碍，而不是在帮助修复一个已存在问题的体系。”

“首要的障碍是缺乏从出生起或在发现听力损失时就引入 ASL（美国手语）。这是关键时刻——它将决定孩子未来成功的可能性，这取决于家长以及当时所提供的服务。之后的所有支持力度都会因这一点而被放大或削弱。对于同时存在其他残障的聋人儿童来说，他们面临的困难更大，需要尽早获得适当服务。而这一障碍由于州政府对聋人事务缺乏认识而加剧。政客的私心和党派之争对州聋人学校造成了不良影响。例如，仅仅因为一位听人校长拥有政策经验、属于某个政党、并且有人脉关系，就被选中领导州聋人教育体系，而不是聘请真正合格、且对聋人事务有深刻理解和认知的人来发现并解决体系中的问题并作出及时有效的改进……”

“…政策和立法需要更多地了解聋人文化，而耳聋和听力障碍者也需要向那些推崇人工耳蜗（CI）的医生传授相关知识。”

早期听力检测与干预

在“缺乏理解”模型的左上方，受访者指出的一个重要类别是听力早期检测与干预（EHDI）。一些家庭和 EHDI 专业人员对如何在各个阶段（从新生儿听力筛查到后续服务提供）最佳支持耳聋和听力障碍婴儿缺乏足够的理解。受访者提到，部分家庭由于不了解 EHDI 的内容及其对聋人或听力障碍孩子的影响，而未能充分利用 EHDI 提供的服务。例如，他们可能忽视早期语言习得的重要性，或缺乏对人工耳蜗手术后随访和康复治疗必要性的认识。同样，一些 EHDI 专业人员缺乏与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有效合作所需的经验、知识和培训。部分受访者指出，这些专业人员（包括相关的医疗人员）可能带有以

“残障”为中心的偏见，从而使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处于不利地位。例如，他们可能不了解美国手语（ASL）在早期语言习得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理解不足与偏见会影响部分专业人员为家庭提供的支持方式，进而影响家庭支持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充分发挥潜能的能力。至于 EHDI 与“语言与沟通”以及“HAT”（听力辅助技术）之间的联系，将在本报告后续部分详细说明。

以下是与“EHDI”相关的部分受访者示例：

“……我们确实知道，总体而言，轻度和单侧听力损失的儿童获得服务的可能性要低得多，有时这正是由于早期干预部门缺乏理解所导致的。”

“早期干预的工作人员在与聋人/听力障碍（D/HH）儿童合作方面培训不足，这会在 IFSP（个别化家庭服务计划）会议、成果，以及为儿童和家庭提供的发育服务上造成问题。正因为如此，期望值可能会很低，因为这些专业人员不知道针对不同听力状况应有的合理期望……”

“最早接触到被确诊为听力损失儿童的机构，是家长最信任的人。在某些州，这些机构和为 DHH 服务的巡回教师或 EHDI 个案工作人员，甚至由完全没有接受过聋人/听力障碍婴幼儿、儿童或成人工作培训的人监管。这对不知情的家长来说是极大的损害。这些机构往往根据自身的服务能力来评估孩子的需求，而不是根据孩子的实际需要。这种带有偏见的评估方式无疑会阻碍 DHH 学生在学业、语言和社会情感方面实现潜能……”

“即便有了新生儿听力普查，对于在普查中‘需要复查’的家庭来说，依然面临适当跟进的挑战。许多家庭不了解返回进行诊断性听力评估、以确认孩子听力水平的重要性，这成为获得适当服务的障碍。此外，许多在幼年被确诊为聋人或听力障碍的儿童，并未在年幼时获得适当的干预服务。这既是由于缺乏对服务重要性的理解，也是由于缺少合格的一线服务人员。许多为幼龄 D/HH 儿童提供服务的人员，并没有足够的培训，也缺乏针对 D/HH 儿童需求的早期干预专业知识。”

“我在[州]的 EHDI 项目工作，很清楚在接受、理解以及对家长经历的支持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时候家长对可能的听力损失持否认态度，也不愿意进行早期检测与干预，这会延迟孩子的语言与发展。”

“……早期干预——我认为持续培训教师、开发材料并教授策略，让家长意识到早期干预的重要性，以及他们早期的参与对孩子成功的关键作用，是非常有益的……”

“……家长从服务提供方那里获得的选择范围并不完整，往往只接收到提供方自己了解或支持的方案。因此，家长并不总是为婴儿做出充分知情的决定。这会影响到孩子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发展……”

“由于早期缺乏语言——可能是因为没有早期干预、对聋缺乏认识，或者家庭环境中没有使用 ASL——聋人或听力障碍儿童将无法充分发挥潜能……”

“……医生和家庭对预期结果缺乏正确理解，而且缺乏足够合格的服务提供者来教育和支持这些家庭……”

语言与沟通

在“缺乏理解”模型的左侧，语言与沟通在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受访者指出，社会对于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学生，以及不同工作环境中聋人群体的语言与沟通需求缺乏充分理解。如何与他们有效沟通、如何确保他们达到符合年龄发展的里程碑（例如对 ASL [美国手语] 的需求），是帮助他们实现潜能的关键环节。此外，社会中还存在一些误解，比如高估或低估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对周围语言的理解与获取程度，这可能导致沟通障碍和他们在语言获取上的受限。受访者还提到，语言习得不仅直接影响沟通能力，还会影响其他发展里程碑，包括学业能力和社会情感技能。“语言与沟通”类别与 EHDI（听力早期检测与干预）和 HAT（听力辅助技术）有交叉之处，这些联系将在本报告后续部分进一步阐述。。

以下是与“语言与沟通”相关的部分受访者示例：

“……不理解为什么在主流学校中没有语言基础的学生进步不会很大。”

“……缺乏对聋人/听力障碍儿童语言与沟通习得过程的了解，而这与理解词义的读写能力息息相关……”

“缺乏对言语和语言发展的理解……”

“……我认为，不理解 ASL 作为一门语言学科和作为教学语言的重要性，阻碍了聋人/听力障碍儿童的发展……”

“语言与沟通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特别是因为聋人/听力障碍学生必须学习两种语言才能掌握阅读和写作，而这两项技能是学校成功的必备条件。很多人并没有

意识到这一点。读写能力与此直接相关，如果聋人/听力障碍学生被期望与从小接触英语、用英语阅读、写作并完成作业的学生达到同一水平，他们就会处于明显劣势。当人们没有认识到聋人/听力障碍学生为了学习第二语言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时，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学生的表现不如他人，而事实上他们付出的努力是别人的两倍。”

“……太多聋人/听障儿童被误以为能听到所有说出的词汇，只因为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听……”

“作为一名有额外残疾的聋人高中生的家长，我的经验是，听人常常忘记她是聋人，甚至不愿意做一些能改善沟通 and 理解的简单事情：面对面交流、先引起注意、清晰表达。他们还会认为/表现得好像只要用同样的英语——只是说得更大声、更慢——就能解决一切，却不理解聋人常常在语言和一般知识方面存在的差距。这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学业指导、课外活动以及社交互动……”（家长）

“合作——我们在集体中常常感到被排除在外。语言与沟通——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听人重复一遍，有时听人会说‘算了’，或者拒绝重复。在集体中，没有人愿意为我口译，因为我有听力障碍。人们会质疑我为什么声音听起来很奇怪……”

“……鉴于 90% 的聋人/听力障碍儿童的父母都是听人，且不会 ASL，因此假设 ASL 会是这些孩子的第一语言并不总是准确的……”

听力辅助技术

在“缺乏理解”模型的右侧，“听力辅助技术（HAT）”是一个重要类别。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通常会配备 HAT，但受访者指出，社会对这些技术存在不同程度的理解不足和误解。例如，有人不了解 HAT 的正确使用和维护方法；也有人错误地认为 HAT 是一种“治愈手段”，因此专业人士和家庭可能会将佩戴 HAT 的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视为拥有正常听力的人来对待。这些问题表明，即使提供了 HAT，仍有许多需要解决的方面，包括认识到 HAT 的高昂成本及其对低社会经济背景家庭的影响。由于理解不足和存在误解，一些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在获取所需信息时仍可能面临困难。该类别与“语言与沟通”类别密切相关，这一关联将在本报告后续部分进一步阐述。

与“HAT”相关的部分受访者示例：

“……孩子们被要求用耳朵听（甚至因为‘没听’而被当众训斥），却从来没有人定期检查他们的助听器是否正常工作……”

“在我所在的社区，目前流行且错误的观念是：只要学校配备了调频系统（FM），任何学校都能教好聋人/听力障碍儿童。”

“……普通教育教师并不完全理解聋人/听力障碍学生的能力，也不了解人工耳蜗和助听器并不像眼镜那样能直接矫正问题。”

“……普通教育教师不理解助听器并不会神奇地让学生像正常人一样听到声音，助听器或 FM 系统也不会让语音变得更清晰，他们处理快速语音的能力远不如听力正常的同龄人……”

“期望值：与佩戴助听设备（如助听器/人工耳蜗）的聋人/听力障碍儿童一起工作的成年人，往往不了解这些技术并不完美，无法修复听力损失，让孩子听得像正常人一样。因此，看护人、教师等经常会认为，‘我知道他/她能听见我！’——而实际上孩子并没有听见。但这些成年人因为对设备功能的错误预期而坚持这种信念……”

“……助听器通常是低端型号，而且维护不到位。我的大多数学生直到 3-4 岁才获得助听设备，在上学前的使用也一直不稳定。”

“……许多家庭和其他专业人员并不清楚助听器、FM 系统或人工耳蜗在增益上的实际局限性……”

“……一些家庭为孩子选择了人工耳蜗，但完全没有进行后续康复治疗；他们以为植入后孩子就成了‘听人’……”

“……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难以支付助听器费用，也不清楚它们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学龄前儿童和在校外的学龄儿童而言……”

家庭参与

在“缺乏理解”模型的右下方，家庭参与是另一个重要类别。受访者指出，许多家庭往往缺乏对如何满足聋人或听力障碍孩子需求以及如何最佳支持其发展的理解，这会影响他们的参与方式和支持力度。例如，他们可能不了解学习 ASL（美国手语）的益处，或忽视人工耳蜗植入后的持续随访的重要性。受访者强调了家庭参与的关键作用，并指出许多家庭此前从未与聋人或听力障碍儿童有过接触，因此需要获取信息、资源和支持，以便做出充分知情的决定。此外，社会对耳聋和听力障碍群体的偏见可能会误导家庭，从而影响他们对孩子能力的认知及其支持方式。此外，社会对聋哑及听障群体的偏见也可能误导家庭，影响他们对孩子能力的认知以及支持方式。同时，一些家庭可能对相关法律

(如《美国残疾人法案》ADA) 不够熟悉, 也不了解如何为自己的聋人或听力障碍孩子进行有效的权益争取。

与”家庭参与”相关的部分受访者示例：

“许多家庭会根据最先接触到的专家建议来做决定。相关信息应当被全面地讨论, 让家长一开始就了解各种可能的结果。这样, 当事情未按计划发展时, 他们就不必再次经历接受的过程。我多次见过家长在得知还有其他可选方案时感到非常沮丧, 而这些方案可能更适合孩子的教育需求, 但他们此前并不知情, 因而在不得不走不同路径时十分艰难。”

“一切始于家长。如果家长不相信诊断结果, 或者被悲伤与怀疑所困, 他们就无法在教育 and 获取资源方面前进。即便家长愿意继续推进, 但若亲友因缺乏理解而不支持, 也会延误获取必要资源的时机。”

“如果我更能早知道我儿子是聋人的话, 我相信他的听力损失会更早得到评估。我原以为他到3岁甚至更早就会开口说话。因为我们对聋这个情况一无所知, 接受这个事实非常困难。这件事影响了我整个家庭……”

“……为家庭提供翻译好的资料, 让他们了解聋及额外障碍对孩子高中毕业后机会的影响。。”

“在我所在地区, 家庭大多来自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 他们缺乏知识或资源去理解听力损失儿童在语言发展和入学过程中的特殊需求……”

“……一旦确诊, 家庭成员和照护者必须了解听力损失的程度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这样才能知道如何以最佳方式与孩子沟通和教学……”

“……家长需要了解 ADA 法案。我认为很多家长并不了解 ADA 以及他们的权利……”

“…家庭参与/支持/理解不足：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家庭过于依赖体系或政府去‘修复’或‘提供’, 而事实上, 他们自己才是拥有在家庭中成为变革推动者的力量……”

“……让家长以公正、无偏见的方式了解可选择的方案同样至关重要……”

“家庭参与、支持与缺乏理解——有些家庭对多种可用的沟通方式(如 ASL、美式手语提示发音法 Cued Speech) 仍感到不适, 或不愿意接触聋人社区, 或对聋人文化不熟悉。他们不知道去哪里才能获得最好的信息。一些有残障学生的家庭, 可能因为需要加班工作以养家, 而无暇参与各类活动或专业培训。”

“……有时候, 缺乏信息的家庭成员在社区中没有适当的资源来帮助自己, 因此更积极的外展工作无疑会发挥重要作用……”

学校教育

在“缺乏理解”模型的左下方，学校教育是受访者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指的是正式的教育环境（如课堂、主流教育项目）、教学方法或策略，以及满足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学术需求的教育体系。

在学校教育中，关于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尤其是同时伴有其他障碍的学生）的知识、理解与经验存在严重不足。这种缺乏理解会影响州级与学校层面的立法者和管理者在为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谋求最大利益时所作出的决策，例如执行《残疾人教育法案》（IDEA）的相关要求。这些决策会影响到学校从招聘政策到资源分配的各个环节，包括引入一些并非为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设计的资源。结果，这些学生可能无法获得他们在学术和语言方面所需的支持与资源。

此外，从学校管理者到听力学专家，尤其是在普通教育或主流教育环境中的教育专业人员，可能缺乏与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有效合作所需的知识。一些受访者指出，这些环境中普遍存在对学生能力和行为的低期望、误解与假设，导致学生在学业上遇到困难，并在语言和沟通获取方面受限。

还有受访者提到，一些教育专业人员不精通手语，也不了解语言可及性和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另有受访者表达了对同龄人的担忧，认为同学的缺乏理解可能会对他们与聋人或听力障碍学生的互动产生负面影响。上述部分问题可能源于缺乏相关大学课程或学术体系不足，而在农村地区这种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满足并支持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需求的重要一环，是要理解他们的教育经历与学业表现可能在多方面与其听力水平相关。此外，还需要充分认识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独特需求，并确保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其中包括：

- 制定和落实个别化教育计划（IEP）
- 确保进行恰当的评估与教育安置
- 采用最佳教学实践

- 促进偶发性学习和同伴社交机会
- 更高效地开展合作
- 合理提供和使用便利条件（如手语翻译）

与“学校教育”相关的部分受访者示例：

“我认为，聋人学生，或者像我这种听力障碍学生，最大的障碍之一是来自同龄人的缺乏理解。许多小学或高中的学生并不熟悉听力损失，这可能导致听力损失的孩子遭到同龄人的嘲笑或欺凌。此外，标准化考试或课堂获取信息的重要部分往往依赖听力，这也可能在理解重要任务或概念时给听力损失学生带来障碍。”

“……一线服务人员往往无法与孩子（或本身是聋人/听障的家长）有效沟通，也不熟悉聋人文化和聋人经验（如聋人历史、行为规范、听力至上主义、压迫、歧视等）。”

“……学校工作人员往往不了解听力损失对学生的影响，也不理解人工耳蜗并不是‘治愈’手段……”

“……让没有任何聋人文化、聋人/听障教育方法、聋人/听障课程体系或精通ASL的人来管理聋人/听障项目。”

“……课程、教学、评估/缺乏理解：许多公立学校不了解聋人/听障学生可获得的课程机会，或不愿意采购这些课程。很多学校不了解学生在评估方面的特殊需求……”

“……此外，主流教育中对聋人/听障学生‘并非都一样’的缺乏理解是致命的。不同学生需要不同的服务（这正是 IEP 过程的本质），但这些需求在千篇一律的主流项目中被忽视。”

“我有一个儿子，有轻至中度听力损失，没有其他障碍或发育迟缓。这意味着他应在普通学前班就读，并获得一些支持和评估。然而，缺乏对听力损失、声学环境以及普通儿童发展的理解，限制他的选择，导致对正常行为的误判，并把他放在了更受限的环境中”（家长）

“我觉得，对于不熟悉在课堂上接纳聋人学生的一般教育教师来说，要让他们的课堂、教学和互动对聋人友好，是很困难的……”

“作为一名全国认证的教育领域手语翻译员（K12）及手语翻译培训师，我认为应将标准提升至要求四年制学位、EIPA 4.0 水平，并通过笔试。此外，我在教育体系中的经验表明，其他相关方（如聋人教师、特殊教育部门、州教育主管）在不了

解口译工作实质的情况下为这些专业人员做决定。这包括让完全不了解口译或手语系统的人来监督手语翻译员。”

“教师最初对学生的语言能力或学习能力期望很低——无论这种期望是否合理。很多教师不了解技术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技术来支持聋人学生。甚至会向手语翻译员问：“你每天都会来吗？”

“……作为一名聋人年轻成年人的家长，回顾来看，我女儿的教育因为她的额外障碍以及教育体系在如何为独特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缺乏支持和理解而受到影响……”
(家长)

“在农村地区，想要获得合格的聋人教师 (TOD) 和手语翻译员可能很困难 (甚至不可能)。那些可能已经有学习延迟的学生，就只能在没有能使用他们语言、也不了解他们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教育者的情况下努力追赶。”

“对聋人/听障学生一无所知的管理层，想用和其他特殊教育学生相同的方式来编排课程……”

“……聋人学校也许在便利条件方面做得很好，但并不是所有工作人员都了解基本知识，比如技术、听力图，甚至是家庭面临的抉择。”

“一个很大的障碍是那些既是学习英语为第二语言的 ESL 学生又有听力损失的群体。更好地理解并掌握与这类学生合作的方法会非常有帮助。”

“行政人员 (特殊教育主任、教育总监) 坚持认为‘最少限制环境’就意味着在社区学校就读，即使那里服务有限、没有同龄人、也不承认聋人/听障学生存在语言问题等……”

“……课程、教学、评估——普通教育课堂的进度很快，很多孩子很难跟上。教学由普通教育教师负责，但他们很少使用视觉辅助，也不理解语言障碍。许多课堂正在转向计算机化教学，而我们的孩子无法接触这些内容……”

家庭与学校合作

受访者指出，家庭与学校需要更有效地合作，以支持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在“缺乏理解”模型的下方中央部分，以双向箭头形状表示）。目前，双方在理解和资源方面都存在差距，这使得他们难以为学生提供最佳支持，包括保持合理期望值和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教育专业人员与家庭之间的合作对于确保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获得最优质的教育至关重要，这包括合理的学校安置、教育规划、便利条件的提供，以及学业与社会情感方面的指导。然而，合作的建立与维持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双方缺乏合作的积极性、信息来源不准确、以及对各自角色与责任缺乏明确认识。由于合作缺失，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可能难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

与“家庭和学校合作”相关的部分受访者示例：

“……很多学校并不鼓励家长参与，甚至多次明确表示不希望家长介入。公立学校并没有向家长介绍可供孩子使用的资源，也不鼓励他们参与聋人社区，反而倾向于将他们排除在外。家长因为不知所措，就把孩子的教育全权交给学校。这让人很沮丧……”

“……人们对聋的态度会影响教育。学生不了解，家长不了解，教师（指非聋人教师）也不真正了解……”

“……在没有聋人学校的地方，家长可用的资源更少，这进一步导致他们对聋人情况、ASL、聋人社区缺乏了解……”

“……即便学生住在相对较大的城市，他们和家长也常常不知道可以选择寄宿/走读的聋人学校或主流学校……”

“……有时家长会以为专业人员会处理一切，因此不理解在家与幼儿一起努力的重要性……”

“……缺乏理解：在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会议上，家长常会说‘你才是专业人士’，并完全信任学区的建议。家长需要为资源和合理目标争取，但他们往往对 IEP 过程的真实含义几乎一无所知……”

“在我所在的社区，许多聋人/听障学生的教育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学生来自移民/少数族裔文化的家庭，而这些家庭并不总是理解学校与家庭在合作以最大化孩子成功中的角色。我认为，很多家庭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理解去在家中做出贡献。”

“……有额外残障的聋人学生——我们的儿子有多重残障，症状跨越多个类别。让教师和专家理解或同意，不同的行为在不同时间可能有不同的含义，是很困难的。我们的解释经常被忽视，这些行为被当作‘捣乱’，从而回避了主动解决问题、教授健康应对技巧的机会。”（家长）

“……当我们试图将迟迟才被确诊的听障孩子转入听障班时，被告知他‘聋得不够严重’。尽管他在接受性语言技能方面发展最为落后，但仍被留在特殊教育学前班。

他会说话，因此他们就认为他能听到。他的听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申请了手语翻译员，最后才拿到 FM 系统。后来发现他有 Usher 综合征，他的老师却说：“如果他要失明，就不需要学手语了”……”

“……当她需要融入公立学校时，学校根本没有做好接纳她的准备。ASL 是她的第一语言，她希望以这种语言接受教学，但公立学校拖延与聋人学校达成聘请口译员的协议。他们想自己聘人，却不理解我们为什么坚持由聋人学校来聘。即便现在她在公立学校，教师依然缺乏与聋人/听障学生合作的培训……”（家长）

“……在与有色人种家庭合作时，也存在对文化和语言差异缺乏理解的问题；人们往往在没有确认障碍是否真的是文化因素的情况下就做出假设……”

重叠概述

在“缺乏理解”模型中，早期听力检测与干预（EHDI）、听力辅助技术（HAT）以及语言与沟通这三个类别之间存在重叠关系（图中以斜线标注），而这些重叠又会对家庭参与和学校教育产生影响。以下将进一步说明这些重叠及其影响。

早期听力检测与干预（EHDI）与其他类别的重叠及影响

正如调查反馈所示，EHDI 强调了早期听力筛查以及面向所有家庭、可获得的全面且适切的早期干预服务的重要性。正因其关键性，EHDI 在家庭参与和学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1) EHDI 的质量与可及性直接影响家庭能以何种方式支持聋人或听力障碍孩子；2) EHDI 满足儿童需求的程度会影响他们后续的就学经历和发展。

EHDI 与“语言与沟通”和“听力辅助技术”类别存在重叠，因为后两者通常嵌入在 EHDI 的体系和服务中。

早期听力检测与干预（EHDI）对家庭参与的影响

部分受访者强调，早期干预服务提供者需要与家庭合作，提供资源和支持的必要性。

与“EHDI 对家庭参与影响”相关的部分受访者示例：

“家庭需要从一开始就有合格的一线服务人员进到家中，与他们一起工作，提供语言接触、信息、资源和文化意识，这样将来就不必做那么多‘补救’。”

“……一线服务人员必须充分理解，家庭需要在早期就能接触到其他有聋人/听障孩子的家庭以及聋人成人，以便他们能对孩子的未来有一个清晰的想象。”

早期听力筛查与干预 (EHDI) 对家庭参与和学校教育的影响

部分受访者提到，当聋人或听力障碍儿童被确诊为符合早期干预条件的听力状况后，他们的家庭需要更多支持。同时，学校和相关项目也应为家庭提供帮助，使家长能够更好地支持自己的孩子。

与” EHDI 对家庭参与和学校教育影响”相关的部分受访者示例：

“……最后，我想谈谈期望值、家庭参与与支持。我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因为我认识很多家长/家庭对聋人或听障孩子的期望不够高。从那些在确诊时死死抓住医生提供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对他们的孩子根本不适用）的家庭，到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有听力障碍的巡回教师能够教自己孩子的家长——这些观念都会损害孩子的自信和自尊，尤其是当孩子在场听到这些言论时。家长是否需要了解听力损失的影响？当然需要。但信息应当是全面的，并且大部分应与孩子本人相关，不能被当作绝对事实，更不能是当时能找到的最低统计值。家长和家庭需要更多支持，他们不应该被孤立地独自走过悲伤的各个阶段。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自己有能力去寻求帮助。如果学区/项目/RDSPDs（聋人寄宿日间学校项目）能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就好了。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的孩子可以做到！他们需要明白，当他们相信孩子可以，并传递出高期望时，孩子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许多像 AG Bell、Hands & Voices 这样的组织，会让家长收到相互矛盾的信息，造成困惑……”

早期听力筛查与干预 (EHDI)、语言与沟通以及听力辅助技术 (HAT) 之间的重叠及其对家庭参与的影响

早期听力筛查与干预、语言与沟通以及听力辅助技术这三个类别彼此紧密相连。早期听力筛查与干预与听力辅助技术的许多要素都集中在满足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语言与沟通需求，并为家庭提供所需支持，使他们能够为孩子创造语言输入和支持语言习得的环境。。

这些模型类别会影响家庭参与。听力辅助技术与早期听力筛查与干预和语言与沟通有重叠，因为受访者讨论了 HAT 如何既可以支持也可能妨碍语言发展和语言接触。虽然听力辅助技术并没有在每个引言中被直接提及，但受访者确实在讨论早期听力筛查与干预时提到听力辅助技术的使用和支持，作为早期干预支持的一部分。

受访者表示，早期筛查对于识别听力状况是必要的；然而，一些医疗专业人员和早期干预提供者可能缺乏理解，或者表现出偏见，过于关注口语发展的需要和听力辅助技术（如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的使用，而排除了 ASL 的使用。这些偏见会影响家庭所获得的信息和支持，进而影响他们如何支持聋人或听力障碍的孩子。因此，需要提供全面的早期干预服务，以支持和教育家庭、早期听力筛查与干预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帮助他们了解如何满足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的语言和沟通需求，提供完整的语言接触，并支持语言习得。

关于早期听力筛查与干预、听力辅助技术与语言与沟通之间重叠对家庭参与影响的相关受访者回应示例：

“……在早期干预阶段，我发现家庭就是不理解沟通的重要性。不管我做什么（包括几个州的同事们所做的努力），家长和儿科医生似乎就是不明白。如果医生告诉家长给孩子服药，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医生们竭尽全力让孩子去‘听’，却从不对家长说一句关于沟通在孩子发展各方面的重要性的话。家庭需要有聋人导师来互动和学习……”

“早期听力检测和干预对开启教育过程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让家庭参与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但很多时候，语言和沟通却成了障碍——无论是对家长和监护者而言，还是在理解术语及孩子的沟通需求类型时。必须对家长进行教育，以避免缺乏理解，并鼓励他们持续参与……”

“早期听力检测和干预服务往往不会向家庭提供所有可选方案，因此这些家庭也没有学习手语来和孩子沟通。这一切都与缺乏理解和缺乏合格服务人员相关。”

“所有领域对聋人/听障学生实现学业成就都至关重要。任何在上述领域中出现的障碍都会导致这些学生在成年后难以实现自立。协作——学生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教师、专业人员、家庭、同伴都会对学生的生活产生影响——他们都需要提供良好的支持，并且所有人都需要在同一个目标下协同努力，才能让学生成功。缺乏合作将为学生日后的失败埋下伏笔。早期听力检测和支持——这是家长为孩子的听力发展（与早期语言发展相关）作出决定的重要工具。家长确实需要接触到

所有可能的选项：助听器、人工耳蜗以及 ASL。获取这些资源非常重要，他们需要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利与弊。如果没有这些，孩子将错失语言发展和沟通的机会……”

“早期检测对各个方面的结果都至关重要。过去几年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由于资金不足，现在正处于危机中。这将是毁灭性的。核心问题在于系统没有鼓励家庭之间互相支持或与其他家庭互动。资源没有自由地提供给家庭，这一切导致了缺乏理解，并最终影响孩子的语言和沟通。所有相关机构和组织都在隐瞒信息、资源和服务，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我不确定这是因为真正缺乏合格人员，还是因为资金被错误使用，未用于聘用这些人员。”

“我多次看到家长不知道关于他们聋人孩子的循证选项。医生和专业人士没有掌握所有事实，无法为家庭提供不带偏见的选择。他们仍然把 ASL 视为最后的选择……”

“家庭并不总是明白，孩子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他们学习手语和理解聋的相关方面，而他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是因为缺乏理解。语言和沟通必须在孩子生命早期、对发展至关重要的阶段得到重视，而这往往是在许多家长尚未接受孩子聋情之前，因此合格的一线服务人员对于实现这一必要的干预至关重要。家长常常没有意识到，听力正常的孩子能通过偶然学习获得的知识，聋人孩子必须通过直接教学来学习，因为他们错过了大量的听觉输入。”

早期听力筛查与干预对家庭参与和学校教育的影响

本节重点探讨在“缺乏理解”模型中，早期听力筛查与干预（EHDI）、语言与沟通以及听力辅助技术（HAT）对家庭参与和学校教育的影响。

两位受访者讨论了早期检测和干预的重要性，强调了教育专业人员需要具备深入的知识，以理解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及其家庭的语言和沟通需求。他们还指出，合理使用技术，并确保家庭与相关专业人员获得充分的信息至关重要，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这些儿童的发展。

关于早期听力筛查与干预、语言与沟通以及听力辅助技术三者之间的重叠如何影响家庭参与和学校教育的相关回应：

“考虑到听力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以及语言（口语或手语）在发展各方面的重要性，我坚信早期检测、家庭成员和所有教育者的理解，以及来自合格人员的干预。这些人员必须了解听力损失对学习的影响（无论是在听觉/口语环境还是以视觉为主的语言环境）是最为关键的。”

“这些学生在更好发展方面存在几个障碍。通过早期听力检测、配备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家庭和教育机构的承诺和技术支持下，我们可以让他们的学习和沟通变得更加可行，并使学习内容更易理解。”

语言与交流对其他模型类别的影响与交叉

调查回应显示，语言与沟通在“缺乏理解”模型中处于核心位置，它不仅影响家庭参与和学校教育，还与早期听力筛查与干预和听力辅助技术相互交织。

受访者指出，早期语言习得与早期语言接触是早期听力筛查的关键部分，而学习一种可视语言以及使用听力辅助技术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家庭是否理解支持聋人或听力障碍孩子语言与沟通需求的重要性，直接影响他们对孩子的参与方式，包括他们如何与教育专业人员协作。这种支持与参与会进一步影响孩子的发展。与此同时，专业人员对语言与沟通的理解也会影响他们在学术上如何与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合作，以及如何与这些学生的家庭互动。这凸显了一个关键需求：必须确保家庭与专业人员能够获得全面且可及的服务、信息和资源，从而更好地支持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

语言与交流对家庭参与的影响

正如受访者所分享的，语言与沟通会直接影响家庭参与。家庭对聋人或听力障碍儿童语言与沟通需求的理解程度，决定了他们在支持孩子方面的参与方式。对于刚有聋人或听力障碍孩子的家庭而言，他们可能缺乏满足孩子语言和沟通需求的知识或经验，这会影响到孩子早期获得和习得语言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家庭无法与孩子有效沟通，从而削弱了他们支持孩子的能力，并导致语言发展延迟。因此，正因为缺乏相关知识和经验，家庭需要获得指导，学习如何参与孩子的语言发展，并提供支持，帮助孩子达成符合年龄的语言发展里程碑。这其中包括学习最能满足孩子需求的语言或沟通方式，并确保孩子能够获得语言接触。

以下是与语言与沟通对家庭参与影响相关的受访者回应示例：

“……缺乏家庭参与和支持/家庭中的语言与沟通缺失：父母/家庭成员不会或不使用ASL，因此聋生在学校学到的内容在校外得不到强化或拓展，这导致了读写能力差、对课程、教学和评估工具缺乏理解……”

“……孩子在一个语言环境丰富的环境中学习效果最好。但父母通常既没有理解，也没有专业知识为他们的耳聋或听力障碍孩子提供这样的环境……”

“缺乏理解——听力正常的父母会收到关于他们耳聋或听力障碍孩子的混杂信息。他们应该和孩子说话、打手语，还是两者兼用？伴随着这些困惑，父母在得知婴儿是聋人或听障时，往往还要面对悲伤……”

“……家庭通常几乎没有信息或意愿去学习沟通策略，包括手语。实际上，许多人甚至被劝阻使用手语，而学习手语的曲线陡峭，所以他们很容易放弃学习，也不愿意让孩子学习……”

“家长常常被赋予一种‘选择’语言模式来与聋人或听力障碍孩子沟通，而多数选择都源自听力中心主义的视角，他们倾向于选择人工耳蜗/口语路线，而从未考虑过ASL的益处。我强烈认为，无论听力损失程度如何，所有孩子都应该学习ASL。研究证明，双语/多语儿童在学业上表现更好。那些觉得自己可以选择的父母，往往因为压力过大而走‘容易’的那条路。如果我们能通过立法，确保所有孩子学习ASL和口语（如果合适），那么就能弥补0-5岁因语言剥夺而造成的学业落差。我每天在工作学校里都能看到这种情况，看到那么多孩子因为习惯了不理解而失去了理解周围世界的欲望，把不理解当成了常态，真的很让人难过。父母往往直到为时已晚，才意识到这对孩子的危害性。家长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孩子错过了什么，而孩子自己也不知道，不管他们的听力损失程度如何……”

“家长不知道有一个耳聋或听力障碍孩子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语言剥夺。语言剥夺对孩子和家庭的影响非常巨大，但家庭没有受到相关教育，所以他们完全不知情。”

“……大多数学生的家庭仍然选择说话而不学习ASL，因为学生去聋校（所以他们认为这对孩子来说已经足够了），但事实远远不够。”

“……家庭参与/语言/资源：听力正常的父母需要被告知聋生的语言发展里程碑，并被引导获取适当的资源，以帮助孩子达到同龄水平并为入读幼儿园做好准备。”

“……社会关注/语言/沟通：许多家庭并没有意识到，聋人或听力障碍孩子在早期发展语言有多么关键，这关系到他们发展健康的社会/情感技能，并且在未来学习更高层次学业的机会也会更大……”

语言与交流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支持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满足他们的语言与沟通需求。然而，受访者指出，一些教育专业人员在这方面缺乏理解与经验。这包括：对手语编码英语（Manual Coded English）系统的理解不足、未能提供恰当的便利条件、以及缺乏流利的

手语能力。为了更好地支持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教育专业人员需要接受培训，并获得全面的信息与资源。

以下为与语言与交流对学校教育影响相关的受访者回应示例：

“……缺乏理解：教师和讲演者在满足他们需求方面缺乏考虑，比如课堂和大型集会的安排，让学生能够舒适地看见和听见，需要讲演者使用麦克风等……”

“与课程、教学和评估相关时，教师和学校专业人员常常不了解听力损失对学生获取学术环境的影响。当学生的听力损失被最小化，只因为他们‘看起来好像能听见我’，结果这些学生就会被不公平地贴上‘不专心’或‘开小差’的标签……”

“在我们所在的地区，学校人员通常不会评估使用 SEE（精确手语英语）的孩子的听力和英语能力。很多时候，人们对这一有价值的系统存在误解，也不了解当前关于其有效性的研究……”

“……我发现同事们对什么是 MCE 系统一无所知，而在一所学校里，与一群耳聋或听力障碍孩子一起工作的员工，没有人明白 MCE（手语编码英语）有多个系统，并且各自有自己的规则……”

“普通教育在教育许多残障儿童方面做得很差。谈到耳聋和听力障碍服务时，我觉得主流教育想在缺乏便利条件的情况下教育，而不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我的小女儿在学前班，他们不愿意把她包括在普通学前班里，而是只给她每天 2 小时，并把她拉回到低一年级班级去接受 ASL 支持。我的大女儿是弱听，但因为有一些听力，所以她得到的 ASL 支持极少。这显然是缺乏理解和必要沟通的结果”（家长）

“……语言是一切的关键。（当然我是语言治疗师，所以我这样相信！）让我担忧的是，人们仍然误解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有听力损失儿童的学校往往对技术了解不足，或者没有资金购买相关技术。因此，他们看到一个佩戴助听器、能说一些话的弱听孩子，就认为没有问题。但我看到这样的孩子时，会担心他们的音系和发音系统，以及他们的语言发展。（他们听不到哪些语法性的信息？）……”

“我们遇到过一些聋人教师，他们不会打手语，或者自称会手语但打得非常差。分配给我们的语言治疗师完全不知道如何与聋生合作。学校系统不了解我孩子的需求，也不了解她的语言需求。他们对[某学校名称]存在很多误解，并且说法不准确。给我孩子做诊断的听力师从未提及手语。我的孩子在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语言。我真希望听力师在进行技术过程时，能鼓励我们使用手语。”（家长）

“……对 LRE（最少限制环境）的误解——管理者常常以 LRE 为理由，把耳聋或听力障碍学生安置在普通教育班级中，但这些教室的声学条件很差！由于教室里的噪音，这些学生根本无法获取口语教学内容……”

“……使用 ASL 或手语沟通的学生没有获得与聋人同龄人互动的机会。可以让学生专注于语言技能（无论是基于手语还是听觉/口语模式）的独立教室正在逐渐被取消，因此没有给耳聋或听力障碍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去获得最佳的语言学习和追赶听力正常同伴的途径。”

“我服务过的许多学校都在农村地区。我看到他们在解决听力损失儿童语言和读写需求方面缺乏理解和创新。”

“他们是相互关联的。缺乏理解导致语言和读写能力的缺失。我们也没有专门为聋人英语学习者设计的课程。所有课程都是基于有较强第一语言（L1）的儿童，而我们的多数学生并没有这样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学校依赖技术。对于那些阅读能力不强的学生来说，字幕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无障碍选项。对于那些阅读能力较好的学生来说，教师往往需要支持去获取带字幕的材料，但他们没有提出要求，或者不知道如何获取信息……”

语言与沟通对教育、家庭参与及双方合作的影响

多份回应强调了在“缺乏理解”模型中，语言与沟通、学校教育和家庭参与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家庭与学校之间协作的重要性。

要想有效支持耳聋和听力障碍儿童，学校与家庭之间需要更紧密的合作。正如受访者所指出的，一些学校没有回应家庭在孩子语言与沟通需求方面的请求，也未能为孩子及其家庭提供足够的支持。另一方面，家庭自身也可能缺乏必要的知识来支持孩子。他们需要获得支持与资源，才能有效地为孩子争取权益。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家庭与学校之间协作的质量，导致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语言与沟通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影响他们的语言发展。这包括：无障碍环境不足、社交机会有限，以及早期语言习得缺失等方面。

以下是与语言和沟通对教育及家庭参与影响相关的部分回复示例：

“……家庭不了解语言发展，不经常参与孩子的学习，也没有与学校团队建立关系……”

“在我们的情况中， these 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正在搬到另一个州，让孩子去聋校，因为我们所在的学区拒绝为我们全聋的孩子提供口译。他们有一个聋人/听障班，但因为我们的女儿有其他障碍和创伤史，他们拒绝把她放进去；长期来看，他们只重视说话而不是手语。对于一个完全听不见的孩子来说，这太荒谬了。政策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而学校也不希望家长参与，他们的教育完全围绕发声而不是手语。这既孤立又无知。（家长）”

“让家长看到早期语言习得的重要性很困难。他们似乎不愿意主动联系其他家长并互相支持。家长与教育者的合作非常重要。把资源交到家长手里很容易，但让他们真正使用这些资源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此外，一些学校没有为家庭提供所需的支持。公立学校只接收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的学生。一所学校允许聋生在主流学前班中与口译员一起学习，但如果孩子没有语言基础，这并没有帮助。他们拒绝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把他放入聋人教育班。一所聋校甚至取消了 0-3 岁的项目。这样一来，聋生直到学前班才可以入学。没有任何合适的日托中心能够在家长工作期间帮助聋生进行语言发展。”

“从哪里开始说呢……随着学区越来越理解无障碍的需求，情况正在慢慢改善，但在上述领域仍存在差距——有的很小，有的却很大。许多家庭被告知不要用手语……否则会影响孩子在听人世界工作的机会……但如果无法看懂唇语或听懂听人说的话，就很容易在沟通、语言和读写方面产生缺失，因为其中不足 70% 能被理解。许多学生和教师与其他人隔离，除非有口译员，或者在家中他们是唯一的耳聋或听力障碍者，否则在学校几乎没有机会练习语言。”

“……缺乏理解——作为监护人、教师和/或与儿童合作的专业人士，成年人往往不了解聋人或听力障碍儿童的需求，或听力损失真正意味着什么。如果孩子有一定的口语或沟通能力，许多成年人就忽视了孩子是聋人或听力障碍的事实，并以对待听力正常孩子的方式与他们交谈。结果，耳聋或听力障碍儿童的沟通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双方的误解和挫折。一个有听力损失的孩子会说话，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很好地听见。这只是说明有人在他们的言语发展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孩子仍然应该因其聋人或听力障碍身份而得到特别考虑……”

“在聋人或听力障碍学生在学校面临的困境核心，是语言迟缓，甚至是语言剥夺——这是阻止他们发挥最大潜能的最重要因素。许多听力正常的父母，在面对一个耳聋或听力障碍孩子时感到不知所措，他们并不完全理解这种情况对孩子长期学业成就的严重影响……”

“许多听障儿童被迫进入主流学校，并被贴上‘迟钝’或‘无能’的标签。很多时候，耳聋或听力障碍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或有哪些可用资源；由于缺乏知识和资源，他们在多年里一直感到挫败，有时会表现出行为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合适的资源。当他们最终获得正确的资源，以及为家长和学生提供的 ASL 培训时，这些学生就会开始茁壮成长，做出很出色的事情。”

语言与沟通与听力辅助技术 (HAT) 之间的重叠及其对家庭参与的影响

在“缺乏理解”模型中，语言与沟通类别与辅助听技术 (HAT) 类别相互关联，理想情况下，助听技术应满足耳聋和听力障碍学生的语言与沟通需求。这两个类别的重叠影响了家庭支持其耳聋或听力障碍儿童的方式。

受访者分享指出，家庭往往会得到带有偏见的信息，关于语言与沟通的选择或机会。因此，耳聋或听力障碍儿童通常会被配备 HAT（如助听器或人工耳蜗），而学习 ASL 往往被阻止或得不到鼓励。

以下为与语言与沟通及辅助听技术重叠影响家庭参与相关的部分回复示例：

“太多的耳聋或听力障碍婴儿、幼儿和儿童被配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却被期望在没有任何 ASL 接触或机会的情况下学会说话和听力。他们没有机会习得一种自然的、无障碍的语言（通常是 ASL），来与父母、家庭、同龄人、看护人、教师以及其他服务提供者进行早期流利的沟通……”

“家长常常被误导。婴儿/幼儿没有被教授或接触 ASL，因为人们抱有他们会‘学会听和说’的希望。医疗和听力学界往往首先给家长灌输聋的口语/医学视角，并告诉他们，如果孩子学 ASL，就不会学会说话。是的！这种情况至今仍在发生。之后，家长会被转介到私人 LSL 项目或 AVT 课程，而这些都是强化这种观念。他们相信人工耳蜗就像眼镜一样，会‘修复’他们的孩子。”

结论

该模型是基于耳聋或听力障碍儿童的父母和看护者，以及与这些儿童和家庭一起工作的专业人士的反馈而建立的。当被问及阻碍耳聋或听力障碍儿童实现其学术、语言和社会情感潜力的障碍时，“缺乏理解”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

对耳聋或听力障碍儿童独特需求的认识有限和缺乏清晰理解，可能导致在语言习得、社会情感成长、学业进步和高等教育技能等方面缺乏足够的支持，从而引发关键发展领域的延迟。这说明从社会层面到家庭和教育专业人员自身，都需要更多的培训和教育。若

缺乏更深入的理解，耳聋或听力障碍儿童可能在沟通、融入学习环境和获取适当资源方面面临挑战，最终阻碍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